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12月16日 (第251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中美关系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后峰会时代处理中美基本关系、试探双方在争议问题上意图的唯一方法是谈判，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持久的过程。

中美关系

马凯硕分析中美在印太地区博弈理念的差异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P）网站 12 月 12 日登载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文章称，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博弈理念存在差异，中国关注的长期博弈胜过美国押注的短期博弈。主要内容如下：

核潜艇和贸易均有助于塑造和维护地区安全秩序，前者靠威慑，后者靠相互依赖。从作用机制来看，贸易带来的安全关系将持续更长时间。这一对比恰好凸显了目前中美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博弈理念和手段。美国押注美英澳安全协议（AUKUS），承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和能力，而中国则专注于利用经贸关系来争取邻国，尤其是东盟的支持。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选择似乎是正确的。美英澳三国“志同道合”，联盟关系稳固。与之相比，东盟的组织建构松散，不仅无法就当前的中美竞争态势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也没有能力平息纷乱的南海局势。然而，东盟能够在印太地区建立广泛信任也正得益于这一弱点。东盟凭借协商和共识的文化创造了很多地缘政治奇迹，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项经贸机制，为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若中国持续关注东盟和 RCEP，而美国继续偏好澳大利亚和 AUKUS，那中国将获得最终胜利。

虽然美国面临着两难的战略选择，但曾由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才是美国所需要的。美国应该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资并增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而不是专注于出售核潜艇。

约瑟夫·奈：外交和战略选择是中美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2 月 6 日登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文章称，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最终不是由技术发展，而是由国家的外交和国内外战略选择决定。

文章称，为了应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显著进步，以及逐渐强硬的对外政策，美国开始讨论对华全面“脱钩”的必要性。然而，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领域的“单维博弈”，中美在军事、经济以及跨国关系层面的互动更深，一项好的对华战略必须涵盖中美相互依存的三个层面，避免“军事决定论”。

基于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国际上管理经济关系的规则需要修订。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有助于防止“脱钩”行为升级。中等强国可以联合制定一项信息与通信技术贸易协定，向符合基本民主标准的国家开放。当然，在核不扩散、维和、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领域，中美仍可寻得共同的制度基础。

其次，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将提高自由规范在贸易和技术领域占上风的可能性。在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当下，只有通过与中国、韩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合作，西方才能塑造全球贸易的投资规则和技术标准，确保为海外企业提供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评估中美力量平衡时，技术固然重要，但联盟更重要。

最后，美国能否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还取决于其对内和对外的双向战略选择。对内要增加对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对外要继续鼓励移民。移民仍将在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过于严格的移民政策会阻碍技术创新。

兰德公司：美如何与华进行极限竞争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网站 12 月 8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

社会科学家克里斯多夫·保罗（Christopher Paul）等合著的报告称，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应该重新思考、构建和强化对华战略，以提升其竞争力和影响力。主要内容如下：

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竞争有风险，但不竞争的风险更大。面对中国迅猛的发展势头，美国有能力抗衡中国不断积累的影响力。然而，美国开展对华竞争受国内法、国际法及国际规范的限制，而中国能够抓住这些标准之间的差别成功突围。

要想重新构建和强化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地位，政策制定者应该从中美竞争的新框架出发，综合考量风险与收益。对此，报告将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应对分为五类：一是回应、报复和遏制中国不可接受的行为；二是扩大现有规范的适用范围并推广新规范，制定国际规则和标准，对中国的“越轨”行为进行定性和曝光；三是维持美国在提供全球福利上的领导力；四是支持和建立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五是恢复美国体系的健康和活力。

基于此，报告提供了多项政策建议：1) 利用美国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建立对华竞争的战略共识；2) 加强美国国内能力建设，促进供应链的多元发展；3) 投资军事创新和伙伴关系，以便美国在对华竞争中能承担更大的风险；4) 签署执行现行规范和标准的条约，并在中国感兴趣政策领域的委员会中发挥领导作用；5) 积极反击给中国带来巨大优势的经济行为；6) 塑造美国善于合作、慷慨、保护伙伴和支持新闻自由的形象；7) 推行发展融资计划，鼓励在易受中国经济“胁迫”的国家进行投资。

美学者提威慑中国的现实道路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网站12月6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国防理念与技术中心主任布莱恩·克拉克

(Bryan Clark)等的文章称，威慑中国的可持续现实方案是提高中国“占领”台湾的不确定性，降低由此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并不断调整适应。文章建议：

第一，提高中国的不确定性。威慑意味着让对手相信发动侵略的代价将超过预期收益。美国军方应重点削弱大陆的信心，而不是围绕台湾地区筑起“铜墙铁壁”。美国应利用其行动、态势和能力发展来增加解放军和中共评估潜在军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这就需要美国具有发起奇袭的能力。

为此，美国应首先评估本国和盟国情报界提供的信息，以及开源和商业监视的海量数据，使用计算机工具识别中国的模式并预测其反应和行为。指挥官要能够改变军事力量组合来制造奇袭。印太司令部应优先考虑投资后勤、预置弹药和可重置的导弹防御等作战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有助于丰富军事组合选择。美军还需要更大的射程和弹性。通过空中加油或减少子弹体积来增大燃料存储的方式，提高航母飞机、轰炸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

印太司令部领导人还应与国防部官员合作，迅速解决阻碍成功防御台湾或其他盟国的关键作战问题。例如，如果不能支持从关岛进行的空中行动，或无法使潜艇进入东海，印太司令部的决策空间就会变窄，其行动也会更可预测。

第二，减少行动带来的收益。增加在台湾或钓鱼岛等地区的展示和驻军或许可以增加大陆陷入多边纠纷的风险，并坚定美国盟友的决心。在商业层面，美国政府应鼓励台积电继续扩大在美国的制造设施，这能够防止大陆占领台湾后垄断高端微处理器生产，从而削弱北京可以从中获得的利益。

第三，持续接触。美国网络司令部率先使用的持续接触方法为美国军队提供了一个模式，使其可以制造奇袭，并加重入侵的可能后果。通过不断试探和测试对手的防御，持续接触可以暴露

对手的反应计划或潜在弱点。在现代军事竞赛中，比对手更快的适应能力也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优势。

中美关系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后峰会时代处理中美基本关系、试探双方在争议问题上意图的唯一方法是谈判，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旷日持久的过程。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12 月 6 日登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 (Robert A. Manning) 的文章称，中美首脑视频峰会是双方为阻止两国关系恶化所做的认真努力。峰会试图为中美间可能爆发的冲突设定底线，探寻两国的权力边界，并找到潜在的妥协空间。

曼宁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哀伤的五个阶段”(five stages of grief)¹。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始终认为中国经过改革后会变得更像美国，或至少按照美国的规则行事，这一期望使美国在“否认”这一阶段停留太久。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瞬间进入“愤怒”阶段，开始极力反击。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标志着“讨价还价”阶段的到来。

拜登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价值观和利益之间的拉锯战，经常倾向于实用主义。美国目前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在“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上尚未达成共识。峰会设立了“常识性护栏”，确保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转向冲突。这为两国关系带来了些许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在经济领域，即使深受贸易战影响，中美相互依存关系并未

¹ “哀伤的五个阶段”，又称“库伯勒-罗丝模型”，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库伯勒-罗丝 (Elisabeth Kübler-Ross) 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描述了人在对待哀伤与灾难过程中的 5 个独立阶段，即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

完全消失，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中国“掠夺性”产业政策和经济“胁迫”等强硬行为不仅加剧了中美地缘经济竞争，也使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组建了“反华联盟”，这进一步阻碍了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后峰会时代处理两国基本关系、试探双方在争议问题上意图的唯一方法是谈判，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旷日持久的过程。目前看来，中美在缓和对抗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虽然有限，但并非微不足道。峰会后，中美后续谈判将涉及多领域：

首先，地缘经济仍是中美竞争关系的核心领域。在更广泛的贸易领域仍需美国施加更多压力，迫使中国改变其“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美国、欧盟和日本正就工业补贴问题展开讨论，若三者达成共同立场，将有助于世贸组织的改革，并借此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停止补贴，增加透明度。

其次，在技术竞争领域，在加强自身在监管和制造方面竞争力的同时，美国要积极与中国就技术标准进行谈判。

最后，在战略稳定问题上，中美长期不对称的核武器数量阻碍了两国达成军备削减协议的进程。近来，中美军队在争议地区不断向彼此靠近的危险行为，迫切需要两国进行良好沟通以防止偶发性军事冲突的出现。协调一致的举措能减少双方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地区周围水域和空域进行的“懦夫博弈”。除此之外，中美还需要着手解决技术带来的核风险。

减轻上述风险并非易事，但中国存在就这些问题与美国认真谈判的意愿，毕竟这些问题是决定中美“竞争性共存”框架是否可行的重要衡量指标。

美国外交

美国不会逆转在中东的态势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A）网站近日登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中心高级研究员达莉亚·凯（Dalia Dassa Kaye）的文章称，美国会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不会大规模从中东撤军。文章摘要如下：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从中东撤出所有军队，或利用更小的基地呈现更加分散的地区态势，但基于政治考量、官僚惰性、美国对全球石油市场冲击的持续脆弱性以及美国国防工业的经济利益，美国不太可能马上逆转目前在中东的态势。美国的海湾伙伴希望美国留下来，并将基地视为华盛顿对其安全承诺的标志。美国两党也持续关注伊朗问题，如果拜登政府不能与伊朗政府达成新的核协议，美国将更难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外，以巴冲突也在继续发酵。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正常化是积极的地区发展态势，但不等于处于战争状态的各方就此化解问题。

事实上，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离开，而是以错误的方式留下来。更好的方式是利用地区再平衡的机会，减少对该地区的军事承诺，增加经济和发展援助。美国应制定和实施推动发展和公平的战略，投资于社会经济和治理挑战的解决方案，帮助中东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非大规模军事投入。

美国不应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政权更迭

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Modern War Institute）网站近日登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Mazarr)的文章称，美国与中国在发展中世界争夺影响力的正确方式不是冷战时期的秘密政权干预和代理人战争，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长期以来的系统优势。文章摘要如下：

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可能再次成为中美争夺影响力的战场，但美国应该避免陷入冷战时期的秘密政权干预和代理人战争。这些秘密政权更迭行动通常弊大于利，大部分没能实现目标，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反作用。

要避免与中国展开此类竞争，需要平衡短期紧迫性和长期战略逻辑。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了许多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亲近和地缘政治联盟，不是秘密行动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主导了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这也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塑造影响力的主要竞争优势。美国应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在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长期战略，而不是为代理人战争和秘密政权更迭做准备。四项基本的原则可以指导这一战略。

首先，认识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取决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的吸引力。如果美国的体制继续带来两极分化、经济停滞，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无法取得进展，可能会失去全球许多政治运动的拥戴。其次，认识到塑造对有利美国的国际体系比秘密行动更能够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竞争战略的核心之一是培育秩序，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声机会。再次，提供直接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目标，即使是那些不完全符合美国利益或价值观的政府或改革派运动。这包括经济援助、安全援助、外国直接投资、融入关键的科学和技术网络和其他形式的接触。最后，要有耐心。如果美国要再次证明其社会经济模式是有效的，维持和开放战后秩序，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支持，就需要有耐心。对阻碍过度反应，妖魔化怀疑美国影响力的改革派运动，反而会引发怨恨和反弹。

外交和战略模糊或有助于避免乌克兰危机

《外交事务》杂志 12 月 6 日登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安吉拉·斯滕特 (Angela Stent) 的文章称，俄罗斯政策制定者一直秉持战略模糊，试图掩藏其动机。拜登政府应借鉴俄罗斯的做法，让俄无法确定并担忧华盛顿的能力和计划。

斯滕特称，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引发了外界对俄罗斯即将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的担忧。但俄罗斯可能不是真的表明其将入侵乌克兰，而是通过此举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以就更广泛的问题展开谈论。除了获得华盛顿的关注，俄罗斯此举还意在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支持率下降之际，向基辅施加压力。俄罗斯的举措让乌克兰的欧洲邻国感到不安，让美国猜测俄罗斯的真实目的。这种战略模糊政策加大了美国和欧洲应对的难度，从而限制了西方的行动。

拜登政府可以效仿俄罗斯，与欧洲盟友共同准备多个选项，包括加大贸易和金融制裁力度，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但美国应暗中行事，从而使克里姆林宫也无法确定华盛顿在军事升级时会做出什么反应。

迄今为止，华盛顿主要依靠制裁向克里姆林宫施压，但制裁对改变俄罗斯的乌克兰政策收效甚微，还可能影响与俄罗斯及其统治精英无关的个人和公司，包括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可能对制裁早有预料并做好了准备。

目前，解决俄乌冲突的基础是 2015 年 2 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II” (Minsk II agreement)，但该协议收效甚微。打破僵局的可能方法是重新谈判，代之以一个美国全面参与的进程。未来与美国以及明斯克协议的其他三方 (德国、法国和乌克兰) 谈判的可能性，或许会改变克里姆林宫的考量。如果美国及其盟

友能够给出下一步的保证，乌克兰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或许会减小，从而撤回一些军事活动，并重新与克里姆林宫接触。

美俄关系一直是合作与对抗并存，华盛顿可以继续回击莫斯科针对乌克兰的咄咄逼人举动，同时为重启协议的谈判作准备。两国间“推和拉”的动态是稳定现代美俄紧张关系一种潜在模式。

大西洋理事会为协调美欧对华方式支招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近日发布荣鼎集团中国业务执行主编诺亚·巴金（Noah Barkin）等共同执笔的报告《跨大西洋工具：协调美欧对华方式》。报告称，在中国问题上，美欧必须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关切和优先事项。为了使未来的合作最大化，发展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话语或叙事至关重要。双方需要确定少数优先领域以共同行动，并围绕共同方针搭建起良好合作的势头。

作者认为，美欧在竞争与补贴、强迫劳动与人权以及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这三个政策领域极具合作前景。

第一，竞争与补贴。中国补贴对欧美企业和消费者的巨大负面影响使其成为对华采取行动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以美欧为首的市场经济体需要对中国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共同定义。在补贴问题上加强协调和沟通将有助于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压力。

从短期来看，欧盟和美国可以联合评估中国“扭曲”的经济做法及其对全球的负面溢出效应。其目的是为今后双方有关中国“不公平”经济行为的对话奠定坚实的概念基础，并了解双方的共同关切和优先事项。从中期来看，美国也可能考虑建立一套（与中国）类似的工具。譬如，可以探索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并考虑通过修正联邦采购条例来解决补贴采购问题。

第二，“强迫劳动”与人权。在该方面，美欧采取联合措施

有助于减少企业在不同监管措施下的获利空间；共同的做法也有助于围绕价值观建立一种共同的叙事，并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民主伙伴。协调行动也会限制中方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

从短期来看，欧盟和美国可以就在与人权有关的关切上推动企业界参与的最佳实践进行交流，以确保产业界的参与，并考虑到此举带来的商业成本。为了推动进口禁令的执行，双方可以共同支持发展相关技术，如基于 DNA 的分子标记等，以识别所谓“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此外，欧盟还可以考虑引入一个效仿美国的有限版本“实体清单”，用于与人权相关的出口管制。美欧应考虑任命一支跨大西洋的小型全职工作组，致力于解决阻碍双方在贸易和人权相关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的法律、监管和实际障碍。

第三，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互联互通领域，无论是构建有助于美欧成功的叙事，构建区域合作或集中资源，成功都取决于相互合作，美欧双方可以各自或共同采取许多措施，使其方针更加具体化。

美国可以通过联合报告和收集数据的形式建立一套“共享的事实”，来促进“一带一路”的透明度。将美欧有关倡议（以及与日、澳等其他国家的倡议）放在单一的多边标签之下，如“重建更美好未来”倡议。单一标签将有助于建立吸引力，还能够提供一个相对于中国主张的叙事。欧盟、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应继续努力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或经合组织的框架下对“高质量基础设施标准”进行定义。

美国政治/其他

2020-2021 学年美大学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12 月 6 日发布报告称，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IE）近期发布的数据，2020-2021 学年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可能反映了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在 2020-2021 学年，不到 100 万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注册了线上或线下课程，占全国高等教育机构总入学人数的 4.6%。这不仅标志着与 2019-2020 学年相比同比下降了 15%，而且也标志着自 2014-2015 学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国际学生首次少于 100 万人。

中国仍然是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生源地，在 2020-2021 学年占到 35%。第二生源地是印度（18%），其次是韩国（4%）和加拿大（3%）。虽然 2020-2021 学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但其增速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大幅放缓。

中国留学生赴美人数下降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一些人可能认为美国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海外留学地。一些观察家担心，中美之间紧张的双边关系正在损害美国大学吸引顶尖学术人才的能力，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人才。

中国学生在 2018-2019 年度向美国大学支付了约 150 亿美元的学费。尽管如此，美国公众仍然对限制他们在本国学术界的存在持开放态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 月份的一项调查，尽管大多数受访者（80%）表示，美国学院和大学接受国际学生总体上是件好事，但超过一半美国人（55%）支持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

从年龄段看，30 岁以下的人群中，只有约三分之一（31%）

的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但在 30 至 49 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一半（49%）；在 50 岁及以上的人群达到七成（69%）左右。党派分歧也很明显。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69%）支持限制中国学生，而 56%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为了避免选举灾难，拜登需要敌人而非朋友

《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12 月 4 日载文称，选民对拜登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政策的看法日益负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将美国目前的高通胀归咎于民主党领袖。拜登在选情低迷的情况下，需要找到一个“敌人”以吸引选民。文章内容如下：

在拜登竞选阶段，特朗普是他的完美对手：粗鲁、冲动、无礼、缺乏任何形式的自我反省，自尊心强但缺乏道德感。但当选后，拜登花了太多时间将自己描绘成特朗普的对立面。很长时间以来，拜登都是在回顾过去而非向前看。

白宫现在试图通过彻底重建、更新和推进美国基础设施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来留住并重新赢得选民。但拜登的团队未能有效推销其计划。许多选民并不清楚这些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拜登现在试图将他的刺激计划作为遏制通胀的手段，但这毫无意义。几年后才能产生影响的基础设施投资无法解决目前的供应链问题。拜登的支持率相当低，民主党在国会的情况更糟。国会中相当多的民主党议员将卸任，而从历史上看在任者比新手更容易当选。此外，在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之后，许多国会选区将重新划分。该任务由各州负责，而共和党掌控了大多数州（的选区划分）。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必须迅速找到新的动力。

美学者分析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 杰出访问学者艾伦·沃尔夫 (Alan Wm. Wolff) 近日在瑞士智库“多边之友小组” (FMG) 举办的一次论坛上发言, 分析了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沃尔夫的主要观点如下:

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是“进步的” (progressive), 不是由跨国公司、大企业或大科技公司推动, 而是“蓝色”和“绿色”的, 在社会议题上中间偏左, 会格外关注人权。此外, 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国内经济。这意味着相比于支持国内政策的措施, 发起国际倡议将居于次要位置。四个具体的视角可能对预测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很有帮助:

第一, 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将关注劳工。它不会将贸易自由化作为一般原则, 更倾向于公平贸易和贸易协定的执行。它将倾向于实施美墨加协议的要求, 特别是劳工条款。它将支持旨在进行某种回流的“购买美国货”要求, 但经济效率考量显示这种方法存在局限性。它还将关注某些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安全问题, 但不急于实现贸易自由化。

第二, 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会抵制其认为对“自由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中国政策。它更加关注建设美国而非“撕裂”中国, 但会配合利用出口管制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等企业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并可能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加征新关税。“脱钩”不太可能成为拜登政府的政策, 因为重新配置资源以减少未来不利前景的决定是由企业决定的。

第三, 贸易政策不应干扰联盟的重建。美国是否会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虽然目前还没有, 但不能排除将来加入的可能。如果美国加入, CPTPP 将很可能做出修改。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即建立一

个“印太经济框架”。但该提议的细节仍不明确。

第四，美国的贸易政策会包含世贸组织（WTO）所体现的多边主义。拜登政府的态度似乎是，多边贸易系统是个好主意，但是迷失了方向，使资本而不是劳动获益。对于 WTO 改革，美国认为，成员国无法通过协商做到的事情也不应该通过诉讼做到，应执行议定的透明度要求，并应对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美国例外论”到了梦醒时分

《国会山报》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例外论”人为地限制了美国对世界舞台、美国的政策和行动能力的理解，对全球安全是危险的。

就其核心而言，外交政策是以实力、对实力的认知和现实以及利益为前提的。美国对自身的看法基于独特的环境。华盛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盟国都满目疮痍，它所面临的对手苏联在经济体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华盛顿相信它能够塑造国际事件，避免危机并推动全球稳定。在许多情况下，它也确实做到了。

然而，目前的现实是，全球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前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反民主力量，以及美国进行的长达 20 年的反恐战争，都重塑了竞争环境。这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他们的行动共同促成了这种动态。小布什对“9·11”事件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反应，奥巴马对连续危机的糟糕处理，特朗普的言语和风格，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以及拜登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退，都导致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质疑华盛顿的可靠性，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处境。

随着全球力量平衡的变化，华盛顿却迟迟没有认识到这一发展。这导致美国继续使用同样的工具来试图影响变革，但效果不佳。相比之下，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国家明白，竞争环境已经改变，并且已经发现和利用了美国的弱点。这也是华盛顿感到其努力受阻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部分原因，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公众感到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被“剥夺”的原因。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改变对国家实力的理解和构建。美国应该明白，只有以实力为支撑，面向现实的、政治上可行的目标时，美国的领导力才是有价值的。

例如，在俄罗斯问题上，拜登对莫斯科采取的双重战略方针是明智的——与北约盟国接触并分享有关俄罗斯演习的情报，同时继续与克里姆林宫进行高级别接触。然而，只有当美国了解莫斯科的利益，并从实力地位进行接触时，这种努力才会取得成果。但是，美国并不具备这些要素。因为，华盛顿继续假设权力动态没有改变，假设同样的工具会起作用，而且认为它正在与十年前的俄罗斯打交道。

华盛顿需要现实地反思其地缘政治力量，并通过保持某种程度的谦逊来进行调整。长期以来，美国只是假设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世界还一如既往，而从未做出真正的权衡。今天的现实已经有很大不同，继续忽视这一点将是无知的战略傲慢，对全球安全是危险的。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